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八十四期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六日

编者的话：据说，毛主席是无私和无畏的，他是“公”的化身。他提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文革中，盛行“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公”的最高标准和境界就是“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因为他是人民大救星，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云云。

在民间，农民养头猪、种点自留地的“私”都要破，因为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但是为毛主席修“行宫”，却是属于“公”，因为这是为了毛主席，这是革命的需要。

自古打天下是为了坐天下；只有“造反有理”，才有享受有理，这似乎成了天经地义。老百姓认为，为了毛主席怎么做也不为过；而毛本人也说过：“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据《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当然，毛所追求的更高“享受”应是权力和权斗的过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认定“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他看到“走资派”、“当权派”们（他认为自己被架空）把北京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时候，便毅然走遍祖国大地，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燎原星火。正如以前的“农村包围城市”，如今要“外地包围北京”。不同的是，以前造的是当权派蒋介石的反，而今造的是自己臣子的反。时代不同了，即便是“重返井冈山”，也不宜在山沟里，而要在风光好住得舒适的“高级宾馆”里，以便“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

待到“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打倒，“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很快分裂了。“九一三”一声爆响，盖行宫的“光荣”变成了配合林彪“另立中央”的罪过，直到毛和周出来说话，才躲过一劫。但是，在批林批孔中和四人帮倒台后，旧案一再重提，参与其事者被处理，上边当初的主事者至今保持沉默。

应该说，盖房子在毛不过是小事一桩。4000万元在当年虽然不是小数字（人力、土地、全国各省市的无偿支持，还都不计算在成本之内），他未必多在意——甚至未必过问。比起历代帝王，毛的起居也确有俭朴的一面。问题是，当时的历史是要化私产为公产，灭私权以铸公权，权力是权利的前提和保障，有权就有一切。有限的特权腐败是建立在普遍的贫困基础之上的，国力民力有限，腐败自然也有限。

如今，往日的行宫在众多新建的现代化的豪华宾馆和别墅群中，显得无足轻重。与之相伴的，是毛氏的有限特权腐败已经被官僚的等级腐败所代替。特权腐败在等级腐败面前，特权阶层在权贵资本面前都已是小巫见大巫了。化公产为私产，借公权以谋私权，权钱交易，公权力的普遍腐败和腐败的公开化，即腐败在权力的保障下，达到制度化、法律化，正是当今等级腐败的特点。只是，与当年相比，它少了一份从容与自信，显得贪婪而惶急，因为，它分明听到了历史的脚步。

广州南湖“行宫”修建记

迟泽厚

在广州，大概无人不知北郊有个因南湖而得名的游乐场和豪华宾馆群。但是，在 1971 年之前，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市民，却谁也不知道广州有个南湖。准确地说，从 1971 年 5 月之后，南湖二字才开始出现在高度机密的大比例尺内部地图上。难道这是新开凿的人工湖吗？不是。其实它是白云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个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库。它之所以改名，是因为 1971 年在这里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汪东兴交代为毛泽东建新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初，毛泽东常来广州。初时他的住处只有珠江北岸的中共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 1 号楼，以后又在白云山的鸡颈坑为他修了一组房子。从 1962 年后，连续多年毛泽东未来广州。这期间，除白云山的房子曾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外，省委小岛的房子一直空着。两处房子都没有进行大的维修。

1971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面告诉在京开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毛泽东有意于年底去广州过冬，毛在广州原住的两处房子长期空置，比较陈旧，怕是不适用了，希望军区和省委在广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另行选址为毛泽东新修一处住所。回到广州，丁盛和刘兴元立即按汪东兴的要求亲赴白云山区勘察，两人同乘一辆汽车围着白云山主峰转了半天，但未发现理想的建房地址。

就在广州军区领导人积极筹划为毛泽东修建新住所之时，突然发生了江青大闹小岛事件。这年 3 月末，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由海南岛榆林（三亚）飞来广州，安排她住小岛 1 号楼。以前江青常住这里，那时她对这里环境比较满意，因而军区和省委领导人都没想到会有什么問題。岂知，经过“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经今非昔比，她不仅是毛泽东夫人，而且是名符其实的中央首长，要求自然也就不同已往。她一进入 1 号楼，见这里基本上还是 10 年前的旧貌，便面有愠色。而更使她恼怒的是，经过 10 年发展变化，小岛南面的珠江水面，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宁静。入夜，不时从江对岸的工厂传来机器轰鸣声和汽笛声，还有江上不断驶过的机帆船的“突、突”声，声声入耳。

江青来了个歇斯底里大发作。

“这是成心不想让我休息！”她扯着嗓子命令随员：“走！通知机组，马上准备起飞，回北京！”吴法宪和军区领导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样解释、检讨，江青就是不依不饶。万般无奈，只好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在电话里劝了好一阵子，江青总算给了一点面子，答应天亮之后再走。军区和省委领导不敢再有丝毫马虎，通知对岸工厂立即停工，又责成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迅速组织人力，到小岛东西两侧江面，拦截各种船只，一律不得通过小岛江面。

倘若谁不懂什么叫做淫威，谁不了解当年江青是何等威风，那么，这可算是一个生动的注脚。

第二天，江青余怒未消，悻悻而去。

江青这一闹，让刘兴元、丁盛等人深切感受到为毛泽东以及江青修建新住所的紧迫性。

这一闹，也把原来在北京遥控指挥的汪东兴推上了第一线。4 月 11 日，汪东兴乘专机到广州，稍作停留，即邀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与他同赴海南岛，在陵水军用机场降落后，即转乘汽车去崖县（今三亚市）榆林要塞区大院，察看了不久前江青住过的“元帅府”，就“元帅府”的维修、改建等问题作了指示，随即与任思忠飞返广州。

“元帅府”要维修、改建，也因江青引起。3月间江青住在这里时，嫌房子门太多，风大；嫌电影放映机没有机房，放电影时机器好像在她头上响，让她头痛；嫌她随员住的房子离她太远，她呼叫不便；还嫌“元帅府”没有好车，她的车是用专机从北京运来的。听说江青对“元帅府”的接待工作有这样多意见，广州军区领导哪敢怠慢，赶紧叫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带上一名建筑工程师，赶赴榆林，同海南军区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元帅府”的维修、改建问题；又把省革委会最好的一台银灰色“奔驰280”轿车也调给“元帅府”使用。

4月13日下午，汪东兴在军区大院留园7号同军区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为毛泽东建房方案。汪东兴在提出修建的基本要求之后，特别提到：毛泽东对他在北京之外的几处住所，比较喜欢的一是武昌东湖，二是杭州西湖。武昌的房子设计、建筑好，杭州的房子四周环境好。军区可以派人到这两地看看，将来在选点、施工时，争取把这两处的优点结合起来。

14日上午，汪东兴由刘兴元、丁盛陪同，先看了在白云山东麓老虎洞为林彪修建的房子，然后到军区初步选定的计划为毛泽东建房的磨刀坑作现地勘察。

磨刀坑是白云山东北的一块小盆地，南距沙河约五六公里，东距广（州）从（化）公路约1.5公里。这里原是广州军区工程兵仓库，周围山上是茂密的松林，远离村落，环境清幽，便于保密，进城却又比较方便。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大的水面，而毛泽东又特别爱水。汪东兴也感到这个地块不够理想，希望军区能尽快找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时间紧迫，要作两手打算，可以先在磨刀坑作施工准备。

汪东兴把工程的完工期限定在当年国庆节。他说得极为形象、具体：“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等他老人家从城楼下来，就上火车，南下广州。你们就准备迎接，让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飞武昌杭州“取经”

施工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多月。兵贵神速，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军区便派副参谋长刘如带领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邹合典和一位建筑工程师，乘军区值班专机飞武昌“取经”。武汉方面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对此十分重视，把刘如等安排住在东湖，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刘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接见，然后派专人带领刘如等人参观，详细介绍情况和经验，解答问题。

4月17日，刘如一行飞往杭州，同样受到浙江省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刘如等人不仅参观了毛泽东的住所，还看了正在为林彪修建的房子——过去杭州没有林彪专用住所。

4月18日，刘如一行返回广州。此时刘兴元和丁盛去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临时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员江燮元于19日听取刘如等人汇报。通过对武昌、杭州两地的参观比较，刘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泽东原在广州的几处住所，明显陈旧落后，修建新房刻不容缓。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优点可以借鉴，不难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围环境与武昌、杭州相去甚远，且无法改变。看来还需另觅更理想的新址。他们还认为，武昌与杭州的接待班子实行军队与地方合一、接待服务与安全保卫合一的做法，操作灵活，效率高，值得借鉴。

江燮元赞同刘如等人的建议，指示一面抓紧进行磨刀坑的施工准备工作，一面继续勘察，争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时责成司令部管理局和军务动员部共同研究，参照武汉的模式，拟制组建接待机构的方案。

为了加强施工领导，统一调度施工力量和物资，成立了由江燮元挂帅，有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主要领导和广东省、广州市各一位负责人参加的施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刘如兼主任，王庆林、张小军、邹合典和军区工程兵、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军区后勤部各一名领导为办公室成员。

任务加码选定磨刀坑水库

4月26日，受命专司组织指挥磨刀坑建房工程的王庆林和邹合典，携带工程设计初步方案和有关资料飞往北京，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作了汇报，经同意后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指定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听取汇报。28日，毛维忠来到王庆林和邹合典住处军委三座门招待所，传达汪东兴对方案的审查意见。汪东兴原则同意军区报送的方案。但是，令王庆林和邹合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汪东兴指示军区的任务还要加码：在毛泽东住所附近，还要再为周恩来、康生、江青各修一组房子及相应的附属建筑，而且都要在年内完工！

王庆林、邹合典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汇报了汪东兴新下达的任务，刘兴元和丁盛也吃惊不小，感到压力巨大：据粗略计算，计划为毛泽东修的房子约1万平方米，5个月内完成，已经够吃力了，如今又增修3组，即使到年底也只有8个来月，谈何容易！更何况，磨刀坑那里地幅不够广阔，安排毛泽东的一组房子已属勉强，现在要修4组房子，如何摆布得下？

刘兴元、丁盛决定：一定要另觅新址。

经过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围绕白云山反复勘察比较，最终他们建议把新址定在磨刀坑水库南岸一片地方。

磨刀坑水库比磨刀坑又多两字，但两者环境、条件大不相同。磨刀坑水库水面约1平方公里，状似一条头朝西南尾向东北的鳄鱼，有六七条较大的分汊。它与磨刀坑相距不过1.5公里，但中间隔了座山，因而各自形成独立小环境。较之磨刀坑，磨刀坑水库的最大优点是有一块不小的水面。这里虽不能与武昌的东湖和杭州的西湖相比，但在广州市郊，却十分难得；更何况水库四周有青翠的山峦林木，这方面的条件就不让东湖和西湖了。

据初步测算，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地段近2公里，更兼这里地势起伏，树木掩映，建房容量很大，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经刘兴元、丁盛看过之后，终于决定把计划给毛泽东修的房子定在磨刀坑水库，江青的房子也安排在这里，周恩来和康生的房子则放在磨刀坑。

5月12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二次进京。他们带去了磨刀坑水库一带的地形图和其他有关资料。像上次一样，还是先由毛维忠听取汇报。

13日晚，毛维忠再次向王、邹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对磨刀坑水库环境很满意，他大体赞成军区对建房布局的意见，但是，汪东兴特别交代：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不要靠得太近，要把江青的房子“甩远一些”。王庆林、邹合典听后纳闷儿不已。

汪东兴要求军区尽快呈报设计图纸，他要亲自审查毛泽东住房的图纸；周恩来住房的图纸则交由邓颖超和总理办公室审查。

王庆林、邹合典回广州向军区领导汇报了汪东兴的指示，军区领导和机关又是一轮紧张的运作。在具体研究4组房子的定位问题时，军区领导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面积很大，再考虑到将来的管理问题，何不把4组房子都集中到磨刀坑水库来？

5月26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第三次进京。他俩不仅带去了4组房子的分布图、设计图，还带去了低空拍摄的航空照片，磨刀坑水库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一览无遗。

这次是毛维忠和汪东兴一位姓孙的秘书一起听王庆林、邹合典的汇报。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毛维忠在听汇报后当场讲了许多看法，那位秘书也讲了不少意见。可以看出，这位秘书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生活习惯极为熟悉，对园林建筑也颇为在行。

毛维忠在临走时说：“这是最后一次审查了。你们回去就要马上组织开工。不过，刚才我讲的不一定算数。我还要向汪主任汇报，看看他还有什么指示。你们先不要走，说不定汪主任还会直接听你们的汇报。”

果然，5月31日，王庆林和邹合典接到孙秘书的电话：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孙秘书亲自开车把王庆林、邹合典接到人民大会堂。

由于汪东兴已经仔细看过了广州军区上报的书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邹二人再作全面汇报，他们只根据汪东兴的提问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接见主要是听汪东兴的指示。

汪东兴首先对广州军区1个月来的工作大加夸奖，认为军区主要领导领会意图好，决心大，

行动快，所以才有现在的成绩。他赞同军区把4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库南岸的意见。接着谈到技术问题。汪东兴谈得十分具体，对计划修建的4组共40栋房子从布局、结构、环境布置到内部装修、陈设，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别是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讲得尤其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连地毯边角的图饰、色调，哪一盏灯的位置和灯管、灯泡的瓦数，这些极不起眼的问题，都有明确要求。王庆林、邹合典竖起耳朵听，飞快地记录，唯恐有点遗漏。

讲到最后，汪东兴忽然又给王庆林、邹合典来了个意想不到：“磨刀坑水库这4组房子大体就这样了。那么，原来你们选的磨刀坑那里怎么办呢？你们回去向军区首长讲一下：那里还是利用起来，仿照磨刀坑水库第一组房子的模式，在那里给主席再修一组。那个地方也有优点：隐蔽、清静、朝向好。这样，一共修建5组房子。还有，省委小岛1号和鸡颈坑的房子，你们也要改建好。将来主席休息主要在磨刀坑水库或磨刀坑，办公可以到小岛或鸡颈坑，让主席活动一下。”汪东兴还给这种活动方式起了个名字：“坐车被动运动”。

就这样，一番轻松的谈话给广州军区下达了一项很不轻松的任务。

接着，汪东兴又讲了一句让王庆林和邹合典头大的话：“建筑材料你们自己解决，不要找我们，我们管不了！”

汪东兴也不是什么都不管，王庆林和邹合典上次来汇报时，他答应给军区解决30辆轿车，国产“红旗”和苏联“吉姆”各半；还给解决两台大电影放映机，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各放一台。

磨刀坑水库改称南湖

接见将要结束时，汪东兴又讲了新房建成后的管理机构问题。他说：“机构的名称，就按你们的意见，叫南湖招待所吧。磨刀坑水库以后就改称南湖，磨刀坑改称松园。招待所把这两个地方统管起来。”

为磨刀坑水库和磨刀坑改名，最早出自刘如和王庆林的建议。一次在现地研究施工计划，不知是谁先提出，把毛泽东的住地冠以“磨刀”二字，总觉不雅，而且不利于保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凑了一个意见：武昌有东湖，杭州有西湖，广州在南，何不把磨刀坑水库叫做南湖？磨刀坑有茂密的松林，莫如改称松园。他们把意见报给丁盛，丁盛觉得有理，同意将意见上报。现在汪东兴一锤定音。

从此，在内部地图上开始以南湖地名取代磨刀坑水库，以后民用地图也逐渐改称。斗转星移，那里的本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

接见结束时，汪东兴对王庆林和邹合典重申了四月间他在广州讲过的话：“请你们回去告诉丁司令员、刘政委，给主席盖的房子一定要在国庆节前完工。主席国庆节一过就去广州。从现在到9月底还有4个月，你们务必抓紧！”稍停，他又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七·一’过后，我就让毛局长到广州去看看。”

真是急如星火。

在积极筹划建房工程的同时，广州军区还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和武昌、杭州的经验，紧锣密鼓地研究了组建一个统管广州市军队和地方内部接待机构的问题。受命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参谋长刘如，经过与军区三大部和各有关业务部门多次研讨，建议将新机构定名为“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招待处”，下辖南湖、省委小岛、从化温泉等接待单位；还计划组建5个警卫连，编制总人数1300人。军区领导同意刘如提出的方案，迅即上报，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很快批复同意。

招待处于5月末正式宣布成立，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长张小军被任命为招待处长，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原副主任丁峰任招待处政委。

光荣的政治任务

工程计划一经批准，就马上大干起来。如此庞大的工程，要解决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施

工队伍从哪里来？由于经费无保证，又要求保密，更何况工期紧迫，工程复杂，要求高，因而除经严格审查先雇请 1800 名技术工人外，不得不动用部队和部队的运输车辆以及大量工程机械。

为便于保密，整个工程称为“705 工程”。这一代号来源于 1970 年 5 月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指挥机关因战备由东山迁往郊外山区，需要修建部分营房的规划；与此同时，军区又要为林彪在白云山下修建一处房子，于是将这两项工程统称为“705 工程”。这两项工程于 1971 年初基本结束。如今，南湖、松园、小岛、鸡颈坑等处工程都沿用这一代号。

为了抢时间，在施工程序上不得不打破常规，边设计边施工。

缺少经费和建材，广州军区首长和机关不得不四处“化缘”。被求到的单位负责人，一听说是给毛泽东修房子，一般都慷慨解囊，尽力支援。军区最先求到的是总后勤部。由副部长陈庞经手，一次就批了 1 千万元——事后听说黄永胜已经向总后打了招呼。广东省革委会自然也是捐助大户。缺少木料，向东北求援，沈阳军区帮助解决了 5000 立方优质木材，分文不收。

军队修建高级宾馆毕竟经验不足，需请地方专家能人指导。王庆林、张小军等人想起了广州市原副市长林西。林西过去分管市政建设颇有建树，对园林建筑尤有独到见解，在那闭关锁国的年代曾赴欧洲作过考察，在广东是公认的一位懂建筑工程的领导干部，颇受陶铸器重。“文化大革命”一来，他这一套一下子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情调”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本人也进了“牛棚”。此时他正在广州市革委会从化“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施工办公室给丁盛、刘兴元写报告，建议请林西为顾问，丁、刘照准，批示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办理。施工办公室的几位领导急不可待，立即派人派车赶赴从化，把林西接来。这位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领导干部，全然没有一点市长的派头，同王庆林、邹合典等人一起，长期吃住在工地。在共事的军队干部的鼓励下，他逐渐打消了“穿新鞋走老路”的顾虑，又拿出了他的绝活儿。同样的东西，现在服务对象变了，自然也就不再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了。他的意见受到施工负责人的重视。特别是在环境利用和庭院布局设置方面，他力主尽可能保持自然美，尽量减少人工痕迹，这些意见都被采纳。在修建江青住的主房时，房后有株大松树，妨碍施工，很多人主张砍掉，王庆林反对。林西支持王庆林的意见，他说，修栋房子不过一年半载，这棵松树没有百八十年长不起来，砍掉多可惜！要把它利用起来。他叫人在树的四周挖了个浅池，池中铺上小石块，放进半池清水，树下立了块大石头，刻上“劲松”二字，众人无不喝彩，成为园中一景。林西又叫人把施工挖出的土方在院子里堆了几个数十厘米高的平缓土包，园内空地遍植草皮，很自然地把四周的天然景色与园林之美结合起来。1972 年后，江青曾多次来这里居住。这位刁钻古怪最难伺候的女皇，居然对她住处的环境表示比较满意。曾同林西共事的军队干部对他无不叹服。

参加施工的部队官兵，把施工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冒着高温酷暑，昼夜苦干，在民工的配合下，工程进展神速。到 9 月中旬，小岛 1 号和鸡颈坑 1 号改建工程都已完成，为毛泽东修建的南湖第一组房也已基本建成。眼看国庆节即将到来，广州军区首长逐日了解收尾工程的进展情况，积极落实迎接毛泽东来广州的各项准备工作，唯恐发生一点纰漏。

献忠工程变成甩不掉的烫山药

却不料，霹雳一声，出了个“九一三事件”！

9 月 13 日凌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声音略显急促：“丁盛同志吗？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他的老婆、儿子，坐飞机向北面跑了！你们要注意掌握部队。毛主席命令：广州战区的陆海空军统由你指挥！”

丁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周恩来讲的那个人是谁？他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周恩来连问了几个“你听明白了没有”之后，他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在长沙同他和刘兴元等人谈话的情景，现在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他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毫不含糊地表态：“请毛主席放心，不管是谁，只要他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坚决打倒他！”

放下电话，丁盛马上去找刘兴元。两人决定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接着，军区机关、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军区主要领导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国庆节后毛泽东还能来广州吗？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私下里有此议论。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丝毫也没放松，总是要有备无患嘛！

1971年的国庆节北京没有举行群众集会，也没看焰火，汪东兴多次讲的毛泽东看完焰火就南下广州的计划也落了空。

五月间经军委办事组批准组建的招待处，搭起了架子，兵员却迟迟没有着落。到了年底，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和参谋长孙干卿议论：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首长哪还能到广州过冬！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接待任务，要个大招待处有啥用？招待处几个连队的补兵计划至今也没有批，我们何必硬撑着，干脆把招待处撤销算了！意见报到总参谋部，很快批复同意。12月27日，成立仅仅半年多的招待处宣布撤销，同时成立团级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领导。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始终没来广州。广州军区许多人都说，当初若不是考虑接待毛泽东，哪能兴师动众在南湖修那么多房子？结果白费了力气！

岂止是白费了力气！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满怀一片赤诚，辛勤播种耕耘，到头来收获的竟是一个烫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药蛋，是一只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围绕“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从北京传来对广州军区不利的消息。有的权威人士作了这样的论断：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现在反党叛国，曾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广州军区与林彪关系很深，因此，应该作重点清查。

广州军区机关有些干部私下议论：如果要追溯历史，为什么只到第四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的前身是八路军115师，115师的前身是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三人论地位论威望，都在林彪、黄永胜之上。按照上述逻辑推论，岂不也可以说广州军区是最光荣、最可信赖的部队吗？

“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北京便有人提出：庞大的“705工程”究竟是为谁修的？是不是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从“705”的数字得到灵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弄了个反革命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广州则有“705工程”，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丁盛的补救措施

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叫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

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庆林叫到他家里。丁盛披着件棉大衣，面带倦容，坐在沙发上。一向快人快语的丁盛，此时有些心绪不宁地对王庆林说：“最近北京对‘705工程’有些反映，说是给林彪修的。我们过去也疏忽了，工程没有在国家正式立项，没有‘户口’。我和汪（东兴）主任商量过了，这事儿需要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一下。你对情况熟悉，你尽快准备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计委、建委作个汇报。汪主任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再看看汪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12月3日，王庆林携带“705工程”设计图纸、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飞抵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通信科长。到北京后，王庆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这次他没有被安排住军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那里的工作人员又特热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

随。王庆林感到很不自在。

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

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 420 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主席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

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 3 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的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 1000 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

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

“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

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

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

不到 1 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 4 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东兴对南湖工程代号为什么叫“705 工程”也表示不解，并问“705 工程”的经费开支是否仅限于南湖工程？

汪东兴还对南湖 4 组房子的编号问题作了指示，认为现在的编法不妥。他说：一个办法是不编号，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 1、2、3、4 的顺序颠倒过来，或者把现在的编号打乱重编。将来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说哪套房子是为哪位首长修的，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

汪东兴对房子编号的意见，大概主要是着眼于安全警卫。至于说“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恐怕此话只适用于毛泽东和江青，周恩来和康生绝不会住进计划给毛泽东和江青住的房子里去。

定心丸

王庆林于 12 月 7 日向丁盛、刘兴元、江燮元和军区参谋长孙干卿等人汇报了赴京汇报情况。汪东兴和国家建委领导都肯定了“705 工程”是为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续有些不够完备，这让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汪东兴所作的指示，他们认真研究了落实措施。但是对汪东兴关于停建松园工程的指示，他们却觉得问题很大。当时工程的地基已经打好，各种建筑材料也已大部备齐并进场，而且这些材料大多是为松园工程定制的，无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将会造成很大浪费。会后丁盛、江燮元和孙干卿又去现地察看，觉得工程还是不宜半途下马，三人又向刘兴元讲了他们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还是要一鼓作气，把这组房子修完。刘兴元说：“修起来没人住，就是当仓库，也比半拉子工程丢掉强。”

汪东兴很关心他的指示的落实情况。12 月 29 日，毛维忠奉汪东兴之命专程来广州检查“705 工程”施工质量。他到广州时已近黄昏，乘车迳赴南湖，顾不上休息，由王庆林、张小军陪同，

先后检查了为毛泽东和江青修的两组房子。当晚他住在毛泽东的房子里，亲身体验房子是否适用合格。

第二天，毛维忠又仔细查看了毛泽东在省委小岛和鸡颈坑住过的房子以及军区在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并在鸡颈坑也住了一夜。鸡颈坑的房子虽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组房子都小得多，装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装修，更适于居住。汪东兴和毛维忠决定这里继续做为接待毛泽东和江青的一个备用点。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广州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连日进行长谈，这里便成了她的落脚点之一。这是后话。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参谋长孙干卿在老虎洞会见了毛维忠，毛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后北京一些人对“705工程”的议论和疑问。他承认，工程规模确实大了点，花钱也多了点。他说：“这我也有责任，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这项工程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汪东兴已经在王庆林受军区首长委托在北京写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见，说明工程是为中央首长修的，“与林贼无关”，报中央备案；毛维忠又给广州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汪主任说，你们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后，毛维忠对他看过的几处房子逐一品评，提出改进要求，共有数十条之多，其观察之细致和要求标准之严格，给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检查完了广州，毛维忠又去海南岛榆林检查“元帅府”。直到1972年元月2日，毛维忠返回广州，仍住南湖为毛泽东修的房子。丁盛和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换了意见。

工程概貌

经过1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几千名工人不分昼夜的苦干，包括南湖和松园新建的5组房子以及省委小岛1号楼、鸡颈坑改建工程在内的“705工程”，终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且看南湖和松园新建工程的一些主要数据：

南湖1组：1971年5月2日开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栋、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6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组：1971年6月19日开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栋、6280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组：进度同2组。共建房5栋、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组：1971年8月2日开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栋、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园（亦称南湖5组）：1971年9月开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栋、1.3万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21775平方米。

此外，还为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分队、通信站等）修建办公室、宿舍、营房7000平方米。

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护坑道1条，大型隐蔽部3个，半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动用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整个工程经费开支约4000万元。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

工程堪称高速优质。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1年稍多一点时间；一组1万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建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南湖与松园工程建成，让广州原有的内部高

级招待所无不黯然失色。这里环境开阔，湖光山色，风景幽美，空气清新；布局合理，设计精妙，工艺严格，陈设考究。此外还有两个最大特点：建筑高大、坚固。主房最大房间面积 400 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 8 米，其余房间也在 5 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房子的坚固程度主要着眼于应付突发意外情况：外墙可以抗住 1 发 85 反坦克炮弹的直瞄射击，屋顶能防口径最大的 160 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住 1 枚 3000 磅炸弹直接命中。有人戏言：万一发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转 180 度，也保证不会散架。

毛泽东：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

在广州郊区为毛泽东修房子，作为总策划的汪东兴是何时、如何向毛泽东报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汪氏在他发表的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中，对此一字未提。但广州军区领导人，则是在建房过程中，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的。

1971 年 8 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 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

毛泽东接见丁盛、刘兴元等人时，汪东兴一直在座。

1972 年 10 月 20 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主要是据称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讲到这里，我还插了一句：那里的房子，我去看过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见修的。”

周恩来最后点明了他谈这个问题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后谁也不要再在广州房子的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顶用。尽管广州军区领导人和部队同林彪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九一三事件”后不断有人试图把广州军区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南湖建房问题同林彪挂钩，但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在“批林整风”运动高潮中，竟无人再提南湖房子的问题。相反，那时还不断从北京传来毛泽东表扬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的话，说他们听了毛的“吹风”之后，态度鲜明，转变快，“听我（毛泽东）的话”；“九一三事件”后，又认识错误好，检讨深刻。1972 年 8 月 23 日下午，江青在广州友谊剧院向党政军机关局、师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宣讲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写给她的那一封信。临近结束时，她话题一转，讲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说：“九一三”凌晨，周恩来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林彪出逃情况，她当时就在现场。广州军区接电话的是丁盛。听了周恩来的情况通报后，丁盛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听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他！”撂下电话，周恩来满意地连说了两声：“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还怕大家不信，又说：“这我不是恭维丁盛同志，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江青的这番话博得热烈掌声。江青的表态非同小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会的军队干部尤其高兴，因为这证明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是中央信得过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广州军区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

可是，谁想江青赞扬丁盛的讲话最终却害了丁盛。4 年之后“四人帮”倒台，在劫难逃的丁盛，又被从林彪的“贼船”赶上“四人帮”的“贼船”，说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其罪证之一，就是江青的这次讲话。这是后话。

在这次报告会上，江青还大骂林彪，并借机敲打广州军区。说林彪要暗害她，给她派了一

个特务护士，天天给她下毒，她与林彪不共戴天，可是广州却有人为林彪修“行宫”——她指的显然是军区为林彪在老虎洞修的房子。其实，同南湖相比，老虎洞怕是连小巫也够不上。论规模，论气势，论用途，在广州只有南湖堪称当之无愧的“行宫”。

评论“九一三事件”后一段时间广州军区的政治形势，可以用4个字加以概括：有惊无险。

变局

但是，到了1974年春，风云突变！

1974年1月28日，江青以祝贺南海前线军民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胜利为名，亲笔给到职未及一月的广州军区新任司令员许世友和排名在孔世泉、陈郁、王首道之后的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写信，派了一名作家、一名诗人、一名记者为特使，乘飞机将信送来广州，同时还带来《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等批林批孔“学习材料”各500份。江青说她“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正在“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是心连心的”，要求许世友和赵紫阳与她一起投入这场斗争。

虽然这3名特使中的诗人和记者原是广州军区的一般干部，那位地方的作家也资历不深，但此番身份不同，许世友特别指定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主要领导去机扬迎接，他与赵紫阳则在特使们下榻的军区第二招待所（东山宾馆）迎候。接过江青的信，叫人读了一遍，又与赵紫阳作了研究之后，许世友立即指示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连夜将信用大字排印，部队发到团，地方发到县（海南岛驻军发到连队，地方发到公社），并要求接信后立即认真组织学习。许世友盛宴款待了3位特使，席间说了不少感谢江青关怀之类的话。几天之后，许世友又与3位特使在海南相会，并再次宴请了他们。

1月29日，在军区礼堂召开驻广州陆海空军干部大会，宣读江青来信，军区领导表示要“不辜负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示”，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大会之后，许世友又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谈感想，表决心，定部署。会议结束，党委秘书立即遵照许世友的指示起草电报，感谢江青对广州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并报告对她指示的传达贯彻情况。

江青的来信使广州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迅速起动、升温。江青在北京“批林批孔”是要抓出当代“大儒”，其重点是“批孔”，即从批“孔老二”入手，联系当前路线斗争，打倒她的（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对立面，毛泽东也说过“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话；但在广州，许世友则提出：“批林批孔”主要是批林彪，林彪就是“孔老二”，联系斗争实际，重点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许世友说：“为什么林秃子要来广州另立中央？就因为当时党、政、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司令是他们的，政委是他们的，书记是他们的，（革委会）主任是他们的。广州陆海空军都被他们控制了，三军都有他们的人！”这次运动就是要把这些“他们的人”一个个都揪出来！

但是，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军区党委常委内部还是军区机关，对运动的表现却让许世友很不满意。为改变这种状况，许世友使出了撒手铜：

其一，他拉上4月初才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兼职政委的赵紫阳，让赵以军区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他一起在越秀宾馆接见广州原两派群众组织的33名头头，向他们通报军区运动的进展情况，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都是林彪死党，要求与造反派“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上揭，我们在军队揭”。本来就不甘寂寞的两派头头们，听了这番话大为振奋，当天便把炮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大标语贴到军区机关四周。

其二，把过去黄永胜、刘兴元当政时期因各种原因受过处分被调离军区机关或转业地方的人员，请回军区机关参加运动。这一招很灵。这些人对黄、刘等人满腔怒火，无所畏惧，敢想敢说，很快成为带动运动的骨干力量，造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

进入5月份，运动的温度已经很高，对军区原领导成员“参与林彪武装政变阴谋活动”的材料越揭越多，越揭越玄，很多“爆炸新闻”让人目瞪口呆。许世友信心十足，他频繁召开大小会议，鼓励大家再加一把劲，“捅破这层窗户纸”，“打破沙锅甃（问）到底”，彻底揭开广州

军区被捂了多年的“阶级斗争盖子”，特别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谜底揭开。

许世友为南湖工程定性

修建南湖工程和成立招待处很快成为许世友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迅速定性。他在大会上宣布：“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他住在哪里？就在南湖！南湖的房子是为林彪修的。那个招待处，就是迎接林彪南逃广州的接待处！”

此话一出，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等人是林彪死党自然更是铁定无疑的了，但他们都已调离广州，于是曾参与主持其事的副司令员江燮元、参谋长孙干卿便成了清查的主要对象；几个负责组织施工者，本来就已定为运动中的“重点人”，现在又进一步“升级”，刘如、王庆林、张小军三人的日子尤其难过。三人在小会、大会说明情况，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不想却是越说越说不清，主持运动的领导说他们的根本问题是“中毒太深”，没有“转变立场”，必须“击一猛掌”。而更让三人没有料到的是，正当他们焦头烂额之时，却又后院起了大火。一位曾任招待处政工科科长的干部以“知情人”的身份出来揭发：军区原主要领导早已向招待处领导“交底”，招待处就是用于接待林彪的；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九一三”前招待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军区原主要领导如丧考妣，指示招待处领导在南湖修了两大一小共三个坟包，为林彪招魂，两个大坟包是给林彪、叶群修的，小坟包则是林小贼（立果）的；因为不敢公开在坟包前立碑，便在一棵古松之下立石刻了“劲松”两个大字，表示对林彪反革命罪行的赞颂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

被批斗得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南湖的房子明明白白是为中央修的，中央早晚会为他们说话的。他们苦苦地盼着这一天，特别寄希望于汪东兴，只要汪主任出来说一句话，谁还敢拿这个问题做文章！但是他们的希望却最终变成失望。

急刹车

大约上面也感到许世友的一些做法太出格了，不利于运动的发展。1974年7月29日，终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军区党委常委发来一份紧急电报指示，批评在前一段运动中“随意宣布刘兴元、丁盛等同志为死党、反革命，对其他同志也点名过多，势必造成人人自危”，要求立即纠正；并决定派韦国清来广州主持军区的运动。这份电报属绝对机密，只在军区党委常委中传阅。韦国清虽然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但他二十年来一直是广西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不过问军区日常工作，现在中共中央决定他紧急赶赴广州，主持军区的政治运动，可见事情非同小可。这是对许世友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打击。军区的运动来了个“急刹车”，原来揭发出来的那些引起轰动的材料，揭发者纷纷打了退堂鼓，承认自己撒了谎或者是“听别人说的”，却又记不得是谁说的了。

就这样，对南湖工程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南湖移交广东省委

广州军区机关对南湖工程的清查闹得热火朝天，其实此时的南湖已经不属军区，而改属中共广东省委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东兴堪称毛泽东最具权威的代言人之一。1971年，广州军区领导仅凭他的几次口头交代，便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修建了南湖（包括松园）工程，并按照汪东兴的意图组建了庞大的党政军统一的内部接待机构。不曾料想，仅仅过了两年时间，还是同一个汪东兴，却又对广东的内部接待工作来了个大改变，他通知广州军区和中共广东省委：今后对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工作，仍由省委负责，南湖招待所移交广东省委。于是，整个南湖工程包

括土地园林、全部建筑、各种家具陈设、几十台高级轿车，一概无偿地移交给广东省委；招待所的军队干部集体转业。

南湖招待所交出去了，但是，招待所的黑锅还得由广州军区背着。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南湖工程成了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共同的清查、批判对象，所不同的是，由于省委机关对这项工程的来历所知更少，因而他们所谓的揭发批判就更多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更加不着边际。

1975年10月，韦国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他在一次大会上宣布：南湖工程，中央是知道的，以后大家不要再提了。省委最高领导有了明确态度，果然一段时间以内便没人再拿南湖问题做文章了。

“揭批查”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倒台。一年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运动。上面认为“广州军区……问题比其他单位多”，是“重灾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广州军区出了黄永胜、温玉成、梁兴初、丁盛”，“还有刘兴元”，“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

有了上面的定调，许世友在动员大会上宣布：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基本任务还是要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揭批林彪一伙，就是揭批“四人帮”。他还说，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眼看就要揭开军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了，但由于“四人帮”的干预，运动半途而废。

既然要继续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就要再深入追查南湖工程的性质和用途问题。许世友又提出两点疑问：

第一，1971年5月，军区成立了师级招待处，为什么林彪一死，当年12月底招待处就匆忙解散了？说明刘兴元、丁盛等人心中有鬼，因此，招待处就是接待林彪的！

第二，为什么要将广州至从化的公路改线，而且在新选的线路上开了一条可供隐藏飞机的隧道，还计划修建一段可以迫降飞机的路面，是否是为林彪准备的政变工程？

关于招待处的成立与撤销，前面已有交代。关于广州至从化公路改线工程，最早的倡议者是刘如。广州至从化公路约60公里。把修建南湖工程时新辟的一段通往从化的公路称为广从公路改线工程，其实并不确切，刘如建议修建的不过是从广州沙河至太和一段长约10公里的迂回路。据刘如说，他在受领组织修建南湖工程任务之后，感到这里紧靠广（州）从（化）公路，而且这条路汽车流量很大，既不利于保密，噪音也大。因而他建议，在原有公路以东，利用已有的土路，修筑一条避开南湖通往从化的迂回路。军区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计划新修的路段上距南湖约1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刘如考虑，如果修盘山路，弯多坡陡，行车不畅，而且从山顶可以眺望南湖。他建议：干脆打隧道，虽然工程量和难度大些，也要多花点钱，但从长远看，好处很多。刘如是主管作战的副参谋长，每进行一项基本建设，他都要考虑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他觉得这段新修公路可以把战时需要考虑进去，做到平战结合。他看到，这条路大部分地段地形比较开阔，于是建议选择一段路面拓宽加固，可作为战时飞机迫降的简易跑道；再将隧道加高加宽，迫降的飞机可进入隧道隐蔽，也可作为汽车的防空洞。他这两条意见也被军区领导采纳。刘如随即根据刘兴元的指示，请广州市革委会负责施工，军区工程兵给予技术支持。由于修隧道和飞机迫降路段工程涉及空军，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根据军区指示到现地作了勘察。而“九一三事件”后，顾同舟被定为林彪死党，这便使事情复杂化了。

刘如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当“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这条隧道工程只完成了切口，整条隧道是1973年才打通的，说这项工程是为林彪武装政变准备的，在时间上就无法解释。刘如还有没说出来的意思：南湖工程刚开工时，林彪还是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那时候谁能想到他和毛泽东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再说，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即使林彪真的跑到广州发动武装政变，一条短短的隧道在战略上有啥作用？

刘如的一切陈述都被斥为狡辩。至于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对南湖几组房子修建来历情况的说明，非但全然无用，而且被认定是“为林贼开脱罪责”。唯一出路只能是老实“认罪”，起码要承认自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路线觉悟不高，上当受骗，帮坏人干了坏事，接受“群众”批判，听候组织处理。

在清查南湖工程期间，几位参与其事受批斗者，除了想方设法搜集材料、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外，仍然期盼北京了解南湖工程来历的负责人出来说明情况，这种急迫心情真如大旱之望云霓。他们尤盼此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出来为他们说话。但不知为什么，这位汪副主席依然一言不发。

未了的尾声

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从1977年11月正式开始，于1978年底结束。如果不是广西边境发生战事，几十万大军出动，也许运动还要持续下去。在军区司令部，运动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几名师以上干部作了组织处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人，他们的罪名是为修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伪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处理者都不得参加对越作战。这是对革命军人的最大羞辱。受处理者个个满腔愤懑。

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者始终弄不明白：这项工程从筹划到完工，过程清清楚楚，而且军区领导在“九一三”前就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房子修好了，江青、周恩来和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几位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去住过，都对房子的周围环境和房子的设计、施工大加赞赏，这些房子的来历和用途一清二楚，为什么竟没有一人出来为它正名，说句公道话，不惜让一些人长期蒙冤受屈？

2007年10月3日初稿于广州

2009年4月25日定稿

[全文有删节

原文所列附件（删）：

- 1，“705工程”位置图（1：100000地图，1971年标绘）
- 2，南湖工程分布图（1：10000地图，1971年标绘）
- 3，汪东兴、毛维忠关于修建“705工程”的6次谈话记录（1971年4月28日至12月30日）
- 4，刘如关于南湖工程的3个说明材料（1978年11月）]